

归侨研究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上山下乡历程中的归侨知青*

易海涛¹，叶青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2.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关键词] 归侨；知青；归侨学生；上山下乡；侨务政策

[摘要] 归侨知青作为上山下乡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上山下乡的轨迹与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既相统一又有区别。总体来看，归侨知青上山下乡经历过起步、高潮和全面调整及结束等阶段。因为其侨生特殊身份，1963年之前，国家不安排侨生上山下乡。1963—1966年，国家审慎安排侨生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央侨务政策被打乱，归侨知青与其他知青一道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随着1971年中央侨务政策的部分调整，归侨知青政策也迎来了初步调整。1973—1976年，因“李庆霖上书事件”及中央侨务政策调整，归侨知青政策开始全面调整。1977起，全国侨务机构陆续恢复，至1978年，归侨知青不再上山下乡。在归侨知青上山下乡历程变化的背后，与中央的侨务政策变化有着直接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20)04-0087-08

“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Appropriate Care”: Returned Overseas Educated Youth during the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Movement

YI Hai-tao¹, YE Qing²

(1.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2. School of Social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Key words: returned overseas educated youth;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Movement; policy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bstract: As a special group, educated youth returned from overseas were similar to and also different from other youth during the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Movement. On the whole, they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because of policy changes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mplemen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ior to 1963, the Chinese state did not arrange for returned youth to go to the countryside. Between 1963 and 1966, the state was cautious about them.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isrupting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young and educated returnees went to the countryside to receive re-education from the 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 From 1971 onwards, the

[收稿日期] 2019-11-14; [修回日期] 2020-04-22

[作者简介] 易海涛(1989—)，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史；叶青(1963—)，女，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归侨知青史、中国当代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5ZDB051)之阶段性成果。

policy began to change, especially due to “Li Qinglin’s Pleading Incident”. After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s were resumed nationwide in 1977, returned youths were no longer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有不少华侨归国，并出现了几次华侨归国潮。在此过程中，一些华侨学生（以下简称“侨生”）也因种种原因回到祖国。对此，有研究专门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归国侨生安置工作，并发现国家对这些侨生采取了“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安置原则，意在弱化侨生的特殊性，使之认可并适应于中国社会。^[1]不过，因侨生身份特殊，“适当照顾”的原则一直作为中央的侨务政策精神被贯彻下来。尽管侨生也努力融入新中国，但其仍无法完全脱离其华侨身份。这一点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程中有着直接体现。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国家持续推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此过程中，侨生也逐渐参加到上山下乡中去，成为归侨知青。因其身份特殊，归侨知青在上山下乡中既有知青的普遍性，更有归侨的特殊性，普遍性在于其属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一部分，特殊则在于其上山下乡进程与中央的侨务政策直接相关。目前，学界对归侨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其研究的总体性思考和区域研究有一定推进。^[2]事实上，归侨知青上山下乡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侨务政策的灵活性与原则性，需要对此作进一步辨析。有鉴于此，本文结合相关文件汇编、档案、地方志、领导人传记年谱等资料，在《福建归侨知青及其安置情况初探》^[3]（以下简称《初探》）一文的基础上，对归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程作进一步梳理，探究其在侨务政策史上何以普通，又何以特殊，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侨史、知青史的理解。

一、适当照顾：归侨知青上山下乡之起步（1966年之前）

（一）1963年之前：不安排侨生上山下乡

在中国知青史的书写范围中，1957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当年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知识青年（中小学毕业的青年）“下乡上山”这一说法。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对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修改后的《纲要》中增加了一条，即“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4]这也是中央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标志着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即将开启。尽管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到来，此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未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但在此前后均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了探索。

不难发现，之所以要求推行知青上山下乡，很大原因就在于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业困难。《初探》一文交代了福建归侨学生的就学问题：“大批侨生源不断地归国，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显然超出了国家的负担能力，校舍、师资等资源都十分匮乏。”^[5]这就说明，随着大批侨生归国，其升学困难也在加大，不过，国家当时并不安排侨生上山下乡。195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在《对华南分局关于今夏高小及初中毕业生升学情况报告的批复》中指出，要对归国侨生等予以照顾，“成绩差的侨生在条件许可下，可单独成立中学补习班”。^[6]尽管此后国家一直强调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尽量安置到农业战线上去，但侨生得到照顾，未受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影响。在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共中央在6月5日下发的《关于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指示》中再次指出不能升学的严峻程度，要求各地、各单位动员说服（绝不能强制）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和在家自学等待就业或升学，但“华侨子女由国家负责适当安置”。^[7]正因如此，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均未见有归侨知青上山下乡。

之所以此时不安排侨生上山下乡，一方面说明侨生的升学压力还未大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另一

方面则说明国家对侨生的大力照顾。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就注意对华侨的保护和其作用的发挥。1924年2月15日，周恩来在《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等文章中便强调：海外华侨、工人阶级、智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这“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8]1932年2月23日，毛泽东在领导东路军开展打土豪活动时也强调：“要注意区分土豪与侨眷，不要误抓侨眷。”^[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华侨的作用，搞好新中国建设事业，“国家主要从团结海外广大华侨和争取侨汇的目的出发，鼓励海外华侨回国投资”。^[10]尽管这一过程还可以更加细化，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但其总体方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致不变。如，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在1955—1967年间就吸收华侨投资7000多万元。^[11]除经济因素外，侨胞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加强同所在国家的联系等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当时不安排归侨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因素。

（二）1963—1966年：审慎安排侨生上山下乡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加紧对各条战线的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再次被提出来，并陆续得到补充和完善。一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还属于整个城市人口精简工作中的一环，但后来逐渐从中剥离开来。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城市下放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召开6个大区领导此项工作的小组长会议。周恩来在接见会议代表时指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大事。各大区、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规划。”^[12]这也确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长期性、计划性，大规模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随之开启。据统计，1962—1966年，全国共有129.28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3]

其时，中央的政策也是强调对华侨、侨眷的各种照顾。比如，为解决1961年春节副食品供应问题，上海派工作团专程到外地负责协调工作，其中，在宁夏要求支援上海的内容中专门提出了2000头羊、500斤发菜供华侨消费。^[14]当时的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在工作中存在对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所谓“海外关系”的误解，中央也及时予以制止、纠正，要求必须端正对华侨的认识，加强对干部关系侨务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教育，妥善处理由于所谓“海外关系”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15]但是，一方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发动，侨生的热情被点燃，另一方面侨生的升学、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一些侨生也面临着上山下乡的选择。

总体来看，侨生的升学、就业压力要较其他知识青年小得多，甚至不少侨生主动要求上山下乡而不得批准。据不完全统计，1963—1966年，上海先后动员了约8.14万名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其中，1963年约2万名。^[16]在此轰轰烈烈的赴疆浪潮中，1963年，上海市有50多名初高中毕业的侨生要求赴新疆参加建设，其中态度坚决的有17人。但是，上海市华侨事务处经了解研究，认为不宜一下子批准过多侨生去边疆地区，最终批准13人。^[17]显然，对于侨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上山下乡，中央还是比较谨慎，即便有一些侨生被批准上山下乡，规模也不大。1964年6月13日，华侨事务委员会、教育部、劳动部联合下发的《关于1964年处理归侨学生升学和落考生安置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对年龄小、学习努力、本人要求继续补习的，应该允许他们继续补习，连续落考三次以上的，应该动员他们劳动就业”；“安置落考的归侨学生就业，应该面向农业，组织他们参加国营华侨农场生产劳动；城市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招收新职工时，归侨学生符合条件的，应尽量照顾安置一些”。^[18]由此不难发现，此时段侨生上山下乡虽渐次展开，但其仍受到中央各项政策的照顾，而其原因仍在于侨生身份的特殊性。

二、融入大潮：归侨知青上山下乡的兴起（1967—1972）

（一）1967—1970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

上访的通知》，要求：“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联、请愿、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19]一方面，回城的下乡知青再次下乡；另一方面，城市知青也陆续开始下乡。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刊发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文按语公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20]毛泽东“最高指示”的下发，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大量侨生也随下乡大军被安置到农村、边疆。

《初探》一文重点讨论了福建归侨知青及其安置。除福建、广东等侨乡重镇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有大批归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外，内地也有一些侨生参加上山下乡。据地方志统计，1967—1969年，江西省先后分批接待安置500名从缅甸、印度尼西亚回国的归侨学生，起初这些侨生被安置在南昌、赣州、九江、抚州、上饶等地中学就读，后来大部分参加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21]事实上，此时这些侨生与其他上山下乡知青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例如，从福建归侨知青安置的主要方式来看，主要包括：（1）在农村社队插队落户，其中部分侨生选择回原籍插队；（2）大批侨生被分配到国营农场、林场、茶场或华侨农场；（3）少数侨生参加了福建生产建设兵团。^[22]其实，当时其他知青也是这几种安置方式，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批侨生被分配到国营农场，尤其是华侨农场。大体来看，当时的社会秩序尚未从“文革”初期的动乱中恢复过来，侨生受到的照顾有限。

从1967年断断续续开始，到1968年开启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究竟有多少归侨知青上山下乡？据原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统计可知，1969—1972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516万，^①归侨知青只在其中占很小的一部分。事实上，归侨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数并不容易统计。据外交部1973年7月23日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显示，自1968年毛泽东“最高指示”下发以来，全国上山下乡的华侨学生近1万人，当时仍在农村的约有0.45万人（插队落户0.15万人，国营农场、兵团0.3万人）。^[23]如果仅从1:500的归侨知青与整个下乡知青的比例来看，下乡归侨知青的规模确实不大，但从1万名归侨知青的总数及其特殊身份来看，尤其是其背后涉及的庞大亲属网络和海外联系，则又不可忽视其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外交部报告的数据是1973年统计的结果，说明过去已陆续有归侨知青调离农村。

（二）1971—1972年：初步调整归侨知青政策

尽管归侨知青与其他知青一样蜂拥下乡，但随着中央侨务政策的调整，这些归侨知青也陆续得到照顾。自1971年中央侨务工作开始进行调整，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对归侨知青予以照顾。1971年8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同意外交部关于正确处理归侨的海外关系、归侨的安置就业、生活困难救济及探亲假待遇等问题的意见的请示，并批送纪登奎、周恩来审批”。^[24]同年11月，周恩来“指示成立华侨问讯处，协助华侨、归侨和侨眷查找亲人下落”。^[25]显然，中央此时益发重视侨务工作。而这背后也与当时的国内外情况变化有直接关系。无论如何，受此影响，知青工作也强调对归侨知青的照顾。

据地方志反映，1972年7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在《关于1972年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通知》中就规定，归侨学生下乡主要安排到华侨农场。此外，在这条规定中还包括：“除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国家计划继续升学、患严重疾病或残废者，独生子女、多子女家庭身边只有一个子女以及家庭有特殊困难的不作为动员上山下乡对象以外，其余都动员上山下乡。”^[26]值得注意的

^① 因统计资料的计算人数将1967—1968年下乡人数统计在一起，故难以区分“最高指示”后下乡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考虑到毛泽东“最高指示”下达的时间已到当年末，故计算“最高指示”下达后到1972年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以1969—1972年计。数据来源：《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第1页。

是，这条规定是国务院在1973年7月24日《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附件中列出（详见后文）。那么，这就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这条规定先由地方推出，然后作为地方经验被国务院批准转发；二是地方志编撰有误，存在张冠李戴现象。不过，又据江西地方志记载，1967年安置在江西赣州的100名缅甸华侨于1968年上山下乡，1972年12月底，其中90名调到赣州市皮革厂等国营企业单位工作，另有10名升学（以后又作了安排）。^[27]因此，即便地方志确实有误，但也说明至少自1972年开始，归侨知青的上山下乡政策已然开始调整，只是其力度还没有地方志所列时间时那么大。

三、来去自由：归侨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全面调整及结束（1973—1978）

（一）1973—1976年：持续调整归侨知青政策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下乡的孩子粮食不够吃、没有劳动收入，穿衣、疾病、住房、学习等都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党和国家应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坎。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28]以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为标志，中央开始抓紧了对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就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三天，即4月27日，周恩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关于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情况的汇报”。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近期内提出一个统筹解决的方案”，解决包括归侨知青安置等在内的十余个问题。^[29]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将归侨知青与知青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下放政策、准备工作等并列，可见中央对归侨知青的高度重视。

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文革”以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以下简称“知青工作会议”）。一个多月的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份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份报告。^[30]其中，附件1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草案》指出：“归侨学生下乡的，主要安排到华侨农场。”^[31]这也是前文所述广东在1972年7月所下达规定中的内容。

归侨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在知青工作会议之前确实已经开始调整。1973年1月29日，国务院在批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情况报告》的意见中指出：“要正确对待归侨和侨眷的‘海外关系’问题。对于插队落户满两年以上的归侨学生，各地可参照上海的做法，在可能条件下，给予适当照顾，妥善安排。”所谓上海的政策，其实就是将插队落户满2年以上的归侨学生尽量安置到当地工矿企业，对身体不适宜当地生活的则抽调回上海另行安置。^[32]其实，1972年上海市的100多名归侨学生已经分配到上海的工厂企业，而上海的《报告》中的政策调整，是针对历届毕业归侨学生到外地插队落户的30余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贵州、安徽、江西等地。^[33]也就是说，1972年上海市的归侨学生已经在上海的工厂企业就地安排，报告所提的是针对对外地上山下乡的归侨知青。由此可以理解，1972年不少地方确实已经开始对归侨知青上山下乡政策进行调整，但针对赴外地上山下乡的归侨知青调整则是到了1973年11月，此时已经是“李庆霖事件”之后，也是知青工作会议之后。这也表明，归侨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是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侨务政策，二是知青上山下乡政策。

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中关于归侨知青工作的调整，其实也是受到侨务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归侨学生政策的影响。1973年7月23日，外交部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华侨学生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

尽管归侨知青的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因此，对这批华侨学生的处理，应当根据中央“来去自由”的精神，凡有正当理由要求出国的，应予批准，并对他们存在的问题，妥善加以解决；凡愿意留在国内，可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适当安排到工厂、企业、华侨农

场或做其他工作。对华侨学生的培养使用，以及申请入党、入团、参军、当民兵等，应同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视同仁。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今后应当鼓励华侨学生在侨居国学习，如少数要求回国，可以同意。有关省、市可安排到普通中、小学和国内学生一起学习，不能歧视，在地区上、生活习惯上，应予照顾。上山下乡可安排到生产条件较好、领导力量较强的华侨农场，原则上不动员他们去农村插队。^[34]

显然，外交部的这份报告对当时正在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产生了直接影响，外交部提交报告次日（24日），国务院就已经制定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相关政策。1973年9月，中共福建省委批转《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强调在动员工作中，归侨学生主要动员到华侨农场。^[35]不过，据四川、广东等地地方志反映，尽管国务院在批转《外交部关于华侨学生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时，要求对违反侨务政策的作法采取有效措施，迅速纠正，但未得到认真贯彻执行。^[36]

无论如何，当“李庆霖上书”事件之后，尤其是1973年长达一个多月的知青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确实作了大的调整，这对归侨知青也必然带来一定影响。这一点在《初探》一文中也有专门交代。但是需要注意的仍是一些地方志所反映的情况，即文本层面的政策究竟有多少是真正落到了实处？就福建归侨知青安置工作来看，大部分侨生享受到了政策调整的福利，其生活境遇有所改善。确实，中央政策下达后，各地根据中央文件陆续落实相应政策，不过当时的程序比较复杂，手续也比较严格。比如，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置的天津归侨知青，兵团知青办与天津知青办商议后确定，回天津需要符合以下条件：在外国出生转来国内；在本人及家长的要求下，并经过侨务委员会的审核和公安局的批准。^[37]

（二）1977—1978年：归侨知青上山下乡的尾声

需要注意的是，1973年中央关于归侨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虽然作了相应改变，但仍要求其上山下乡，主要安排到华侨农场。换言之，归侨知青仍需下乡，只是较之前力度要弱。“文革”结束后，中央加紧对各条战线的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侨务工作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周年庆祝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旅行团部分成员时提出：“现在，侨务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准备恢复过去的侨务机构。”^[38]随着侨务政策的落实，归侨知青上山下乡也逐渐退潮。1978年6月16日，福建省政府决定，由时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毕际昌牵头召集有关单位，研究归国华侨中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办法。^[39]随后，持续一个多月（同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即提出“归侨学生、独生子女、父母双亡、中国籍的外国子女不再列入上山下乡对象”。^[40]自此，归侨知青的上山下乡便宣告终结，但其重新安置之路则要更长。

四、余论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归侨知青上山下乡的清晰脉络。与整个知青上山下乡的历程一样，归侨知青上山下乡也经历过从“初澜”到“大潮”再到尾声这三个阶段，但这三个阶段与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历程有相似更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归侨知青与其他知青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文革”前，归侨知青也面临着升学、就业的压力，无法升学、就业的侨生同样面临着上山下乡的选择；在“文革”期间，侨生与其他知青都必须到农业战线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同之处在于归侨知青的侨生身份，导致其历程不同。归侨知青上山下乡主要集中在“文革”期间，而且集中在1968—1973年；“文革”期间归侨知青上山下乡政策调整的时间更早，1971年便已经开始调整；自1973年

开始,归侨知青则主要安置到华侨农场;1978年归侨知青便不再上山下乡,而其他知青仍面临着上山下乡的选择。

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知青上山下乡是当时环境下的必然选择。归侨知青作为知青中的一份子,人数并不多,大约为其中的五分之一,但其在归国华侨中却又占有不小比重。据不完全统计,至1961年,广东、福建两省已安置归侨及难侨约42.5万余人,^[41]若以此计,1万余名归侨知青背后所牵涉的便是上万个家庭、数十万归国华侨及其庞大的海外联系。因此,侨生的上山下乡又有其特殊性。必须承认的是,归侨知青上山下乡历程的变化,与中央的侨务政策变化有着直接关系。1979年5月4日,廖承志在上海会见归侨代表时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执行的,仍然是1952年制订的侨务方针、政策的继续。”^[42]所谓1952年制订的侨务方针,即“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43]这就说明,一直以来,除“文革”期间侨务政策出现一定偏差外,中央的侨务政策一贯突出了对华侨的保护。在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侨生既面临着知青一样的选择,同时也因侨务政策的调整而受到一定的照顾。与此同时,归侨知青在上山下乡中境遇的变化,也影响着各地华侨对祖国的态度;归侨知青不断调离农业战线,无疑有助于鼓励更多华侨加强同祖国联系,为祖国的统一事业、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更多贡献。

【注释】

- [1] 上官小红:《建国后归国侨生安置工作探析》,《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
- [2] 叶青:《归侨知青史研究中的若干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叶青:《福建归侨知青及其安置情况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3期。
- [3][5] 叶青:《福建归侨知青及其安置情况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3期。
- [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6月)》第2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4页。
- [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6月)》第1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8~49页。
- [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6月)》第2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3页。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 [10] 高远戎、张树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
- [11] 张丽红:《历史的细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吸引华侨投资探微——以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
- [1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6月)》第4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4页。
- [13] 《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第1页。
- [14]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对新疆、江苏、四川、浙江、湖南、广西等六省要求支持上海春节副食品供应的要货清单和分赴各省联系的情况汇报》,1961年1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B98-4-1412。
- [1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6月)》第4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5页。
- [16] 兵团司令部:《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分配情况》,1973年12月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馆藏,004-07-0363。
- [17]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华侨事务处:《关于批准归侨学生报名去新疆参加建设工作的情况汇报》,1963年9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B20-2-161-17。
- [18] 杨学为编:《高考文献(1949—1976)》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15、516页。

- [19]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61~62页。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3~224页。
- [21] 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2969页。
- [22] 叶青:《归侨知青史研究中的若干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
- [23] 《知青工作文件选编》,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第84~86页。
- [24]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1970—1978)》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140页。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98页。
- [26] 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第3803~3804页。
- [27] 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第3070页。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76~477页。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589页。
- [30]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 [31] 《知青工作文件选编》,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第91页。
- [32] [33] 《知青工作文件选编》,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第82~83页。
- [34] 《知青工作文件选编》,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第84~86页。
- [35] 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第3141页。
- [36] 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第4118页。
- [37]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关于转发〈关于来兵团的天津知识青年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74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馆藏,档案号不详。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10~211页。
- [39] 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第3156页。
- [40]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李先念年谱(1970—1978)》第5卷,第674~675页;《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32页。
- [41] 庄国土:《中国政府对归侨、侨眷政策的演变(1949—1966)》,《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3期。
- [42] 廖承志文集、传记、编辑办公室编:《廖承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76页。
- [43] 廖承志文集、传记、编辑办公室编:《廖承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49页。

[责任编辑:于丹]